

谢灵运的山水诗与佛学因缘

张二平

(北京大学哲学系, 北京 100871)

摘要: 谢灵运是中古山水诗的确立者, 其人生与佛教关系至密。谢灵运的山水诗一方面极富于声色光影自然清晖之美, 另一方面又即色观空, 深蕴佛理。以上特征的形成, 与他净土信仰的稳定心态及得益于佛学的取象理论有关。始宁山居期间他积极从事于佛教活动, 创作了大量山水诗。这些作品, 具有“山水不足以娱其情, 名理不足以解其忧”的情理纠结, 表现了儒家情志与佛教名理的内在冲突。

关键词: 山水诗; 佛教意象; 净土信仰; 取象理论; 始宁山居

中图分类号: I22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0-6176(2007)03-037-05

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在中古诗坛上优势地位的确立者。他出身于东晋一等士族陈郡谢氏, 5岁起就被送到钱塘道教杜治养育, 15岁才返回建康, 在家族内文义赏会, 作“乌衣之游”。27岁, 入庐山拜见南方佛教领袖慧远大师。晋宋易代前后, 他曾5次出仕, 两番隐居,^{[1] (P78)} 负才傲物, 逢运之穷。在这期间, 他写下了大量山水诗歌。人生的复杂, 思想的斑驳, 使他的作品意蕴丰厚, 错综难解。黄节感叹道:“嗟乎! 康乐之诗, 合诗易聘周骚辨仙释以成之, 其所寄怀, 每寓本事, 说山水则苞名理。康乐诗不易识也, 徒赏其富艳。”^{[2] (P38)}

我们认为, 在“诗易聘周骚辨仙释”诸因素中, 谢灵运的人生及其山水诗与佛教关系最为密切。原因至少有两点: 一是“陈郡谢氏之名人, 与佛教常生因缘。”^{[3] (P313)} 拿谢灵运来看, 与他平时交往的僧人, 就有慧远、法显、慧睿、慧严、慧观、法勔、僧维、僧镜、昙隆、法流、慧琳、法纲、道生、道真等10余人之多, 而他与慧远净土信仰、道生顿悟学说的甚密关系, 更是佛教史上重大公案。他曾自注《金刚般若经》, 参与翻译《大般涅槃经》, 撰写《十四音训叙》, 还创作了关乎佛教的大量赞、颂、铭、诔、论。二是“在谢灵运之前, 完全写山川之诗极少, 文章更少。”^{[4] (P221)} 虽然有康僧渊、支遁、慧远、庐山诸道人等已经进行了山水诗创作实践, 但谢灵运则集中精力进行了山水诗的创作, 在全部五言诗约70首中,

大量的山水诗, 有44首之多。^{[5] (P201)} 东晋的诗僧山水诗, 似乎是为谢灵运的出现而做准备, 到了谢灵运的出场, 他们才退到了历史的后台。由此可以窥见, 中古山水诗的兴起及其确立, 与佛教之间的确存有莫大关系。本文拟从谢灵运山水诗的具体意象出发, 细味诗中的许多特殊字眼, 来探讨其与佛教之间的复杂关联。

一、声色光影: “山水含清晖”

谢灵运的山水诗, 能够从声色光影诸方面捕捉到自然山水清晖之美。其《石门岩上宿》云:“鸟鸣识夜栖, 木落知风发。异音同致听, 殊响俱清越。妙物莫为赏, 芳醪谁与伐。”^{[2] (P39)} 他心细、眼细、手细, 善于倾听, 善于捕捉, 善于描写, 能够同自然山水进行心灵深处而又呈现于文字的微妙交流。

写鸟声, 如:“池塘生春草, 园柳变鸣禽。”^{[2] (P43)} “海鸥戏春岸, 天鸡弄和风。”^{[2] (P76)} 写风声, 如:“袅袅秋风过, 萋萋春草繁。”^{[2] (P94)} “月弦光照户, 秋首风入隙。”^{[2] (P137)} 写水声, 如:“秋泉鸣北涧, 哀猿响南峦。”^{[2] (P88)} “亭亭晓月映, 泠泠朝露滴。”^{[2] (P35)} “崖倾光难留, 林深响易奔。”^{[2] (P94)} “石浅水潺湲, 日落山照耀。”^{[2] (P39)} 这些声音流淌, 或如耳畔低语, 沁人心脾; 或如晴空响雷, 惊人心肺。真是一片天籁, 恍若耳闻。

写色彩, 如:“初篁苞绿箨, 新蒲含紫茸。”^{[2] (P76)} “铜陵映碧涧, 石蹬泻红泉。”^{[2] (P107)} “白云抱幽

收稿日期: 2007-04-11

作者简介: 张二平(1978-), 男,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,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。

石,绿筱媚清涟。^{① 2(P30)}“晓霞枫叶丹,夕曛岚气阴。^{① 2(P37)}在其笔墨之下,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,大自然总是一片生机。诗中的画面,常以清绿、素白冷色调为主,点缀以红色或紫色,给人以清新活泼的视觉感受。

写光影变化,如:“林壑敛暝色,云霞收夕霏。”^{① 2(P71)}“暝还云际宿,弄此石上月。”^{① 2(P39)}“岩下方合,花上露犹沾。”^{① 2(P77)}“野旷沙岸净,天高秋月明。”^{① 2(P57)}“云日相辉映,秋水共澄鲜。”^{① 2(P57)}或明暗对比,让人心里生起时光短促、人生不永之感;或露光微照,引发一种稍纵即逝的顿悟;或一片空明,让人进入到一个清明净寂的世界。

诗人对大自然声色光影的强烈关注,使其山水诗绽放出一种灵妙的异彩。诚如叶燮《原诗》说:“天地之生是山水也,其幽远奇险,天地亦不能自刻其妙,自有其人耳目手足一历之,而山水之妙始泻。”

这些灵妙异彩来自何处又如何形成?宗白华说:“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,代山川立言,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,成就一个鸢飞鱼跃,活泼玲珑,渊然而深的灵境。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‘意境’。”^{① 5(P70)}谢诗中声色光影意象的形成原因,正可以从“心灵映射万象”及“代山川立言”两个层面去考察。

首先,谢灵运对声色光影的喜爱,与他净土信仰的稳定心态有关。其《和从弟谢惠连无量寿颂》云:“法藏长王宫,怀道出国城。愿言四十八,弘誓拯群生。净土一何妙,来者皆菁英。颓年欲安寄?乘化好晨征。”^{① 2(P343)}其《山居赋》云:“苦节之僧,明发怀抱。事绝人徒,心通世表。是游是憩,倚石构草……指东方以冥期,实西方之潜兆。虽一日以千载,犹恨相遇之不早。”自注:“谓昙隆、法流二法师也。二公辞恩爱,弃妻子,轻举入山,外缘都绝,鱼肉不入口,粪扫必在体,物见之绝叹,而法师处之夷然。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,其亦如此。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栖之游,昔告离之始。期生东山,没存西方。相遇之欣,实以一日为千载,犹慨恨不早。”^{① 2(P239)}在佛典中,《无量寿经》对西方净土极致赞美,云:“又其国土,七宝诸树,周满世界。……行行相值,茎茎相望。枝枝相准,叶叶相向,华华相顺,实实相当。荣色光耀,不可胜视。清风时发,出五音声。微妙宫商,自然相和。”在自然山水中,谢灵运也要去寻找这样一个纯净美妙的世界,于是,他努力去捕捉,心灵映射万象,结果使得诗歌意象充满了佛光法韵、净土气象。

其次,晋宋之际,与净土信仰相关,僧俗中逐渐培养出了一种全新的取象观念。402年,庐山慧远倡行了一次中土最早的阿弥陀佛集体信仰,参与人员有僧俗123人,其中不乏著名文人,如宗炳等。412年,慧远叫人描摹佛影、建佛影台,慧远在《佛影铭》序中说:“神道无方,触象而寄。”事后他又请谢灵运作《佛影铭》,谢在铭文中说:“因声成韵,即色开颜。望影知易,寻响非难。形声之外,复有可观。观远表相,就近暖景。匪质匪空,莫测其领。倚岩辉林,傍潭鉴井。借空传翠,激光发罔。”^{① 2(P345)}许理和准确地指出了这些活动中所孕育的新的取象观念,他说:“需要一个具体的能用感官感知的崇拜对象,这形成了庐山佛教的特点。……强调了某种可见物的显现:观想佛像,幻见阿弥陀佛,赞颂佛影、佛的法身或菩萨法身等。”^{① 9(P267)}

佛教净土信仰及其取象观念,沾溉影响中古文艺审美观念既深且巨。魏晋玄学强调“言”“意”关系,主张“得意忘象”;而晋宋佛学强调“心”“境”关系,主张“触象而寄”。慧远的俗家弟子著名画家宗炳说:“圣人含道应物,贤者澄怀味象”,山水画家“代山川立言”,就要:“身所盘桓,目所绸缪,以形写形,以色貌色。”^{① 9(P37)}谢灵运也说:“摹拟遗墨,寄托青彩,岂唯象形也笃,故亦传心者极矣。”^{① 2(P345)}认为,一片风景所呈现的,既是佛之化身,又是主体之心境,而这种化身及心境也必然要通过自然物象去具体体现,否则也就无法传达出心灵的体悟。谢灵运以佛学取象理论指导山水诗创作,结束了东晋玄言诗“理过其辞,淡乎寡味”的历史,从而完成了玄言山水之变,被誉为“元嘉之雄”。钟嵘《诗品》称谢灵运“兴多才高,寓目辄书”,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更概括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变迁:“宋初文咏,体有因革,庄老告退,而山水方滋,俚采百字之偶,争价一句之奇。情必极貌以写物,辞必穷力而追新,此近世之所竞也。”这些说法是确当的。

二、遗情貌世:“贞观丘壑美”

更深层次地看,一切山水意象声色光影也不过是以“分别”之心认识万象所产生的诸种色相而已。《大品经》云:“若如来旨观色空时,应一心见色,一心见空”。《大智度论》云:“佛说诸法,皆先分别,后出实相”。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,更有一些常见的字眼,表示着他对“诸法实相”的体悟。

如“尘”字:“遗情舍尘物,贞观丘壑美。”^{① 2(P118)}“昔闻汾水游,今见尘外镳。”^{① 2(P35)}“空”字更多,如:“禅室栖空观,讲宇析妙理。”^{① 2(P70)}“远山映疏木,空翠难强名。”^{① 2(P30)}“海岸常寥寥,空馆盈清思。”^{① 2(P40)}

还有“理”字频现，如：“感往虑有复，理来情无存。”^{[1] 2(P34)}“孤游非情叹，赏废理谁通？”^{[1] 2(P76)}“三江事多往，九派理空存。”^{[1] 2(P104)}

佛教认为六识出六尘。世间事物不净，会污染真性，所以叫“尘”。化染为净，须由空观。中国僧人早就对所谓“空”作了某些理解，如支遁《妙观章》说：“色不自有，虽色而空，故曰色即为空，色复异空”。罗什、僧肇，更有“缘起性空”的认识，竺道生又进而把佛与“理”通过主体活动连接起来，其《大般涅槃经解》中说：“理者是佛，乖则凡夫。”《注维摩诘经》说：“佛为悟理之体”，“佛以穷理为主”。要悟得此“理”，须由顿悟而非渐修。慧达《肇论疏》引：“竺道生法师大顿悟云，夫称顿者，明理不可分，悟语极照。以不二之悟，符不分之理，理智兼释，谓之顿悟。”^{[1] 7(P114)}谢灵运曾于永嘉任上撰写《辩宗论》，支持道生顿悟义。这样看来，谢诗中的“理”字，主要指涉顿悟佛理，观空天地间。

更进一步的问题是，如何将穷理与观物结合起来呢？慧远《大智论钞》序曾提出过一种观物理论：“于是乃即之以成观，反鉴以求宗。鉴明则尘累不止而仪象可睹，观深则悟彻入微而名实俱玄。”^{[1] 7(P83)}如此观物可以得到色空不二之理。原因是“法性没有差异分别，始终都是空的，有、无虽然看起来相反，事实上仍可在一法上并存”。^{[1] 7(P85)}

谢灵运将其观物穷理的方法称之为“赏”、“妙赏”或“贞观”。如：

“情用赏为美，事味意谁辨。”^{[1] 2(P77)}

“赏心不可忘，妙善冀能同。”^{[1] 2(P72)}

“表灵物莫赏，蕴真谁为传？”^{[1] 2(P57)}

“妙物莫为赏，芳醕谁与伐？”^{[1] 2(P39)}

“研精静虑，贞观厥美。”^{[1] 2(P277)}

“超尘埃以贞观，何落落此胸襟。”^{[1] 2(P283)}

“遗情舍尘物，贞观丘壑美。”^{[1] 2(P118)}

所谓“贞观”，就是在观照声色光影中悟出万化皆空之理，然后返观自我，进而觉悟到自身之空。如《石壁精舍还湖中作》：

昏旦变气候，山水含清晖。

清晖能娱人，游子憺忘归。

出谷日尚早，入舟阳已微。

林壑敛暝色，云霞收夕霏。

芰荷迭映蔚，蒲稗相因依。

披拂趋南径，愉悦偃东扉。

虑澹物自轻，意惬理无违。

寄言摄生客，试用此理推。^{[1] 2(71)}

诗题中的“石壁精舍”、“湖”，谢灵运《游名山志》云：“巫湖三面悉高山，枕水渚，山溪涧凡有五

处，南第一谷，今在所谓石壁精舍。”^{[1] 2(P403)}此诗以“还”为线索，写从石壁精舍动身，出谷入湖，经湖中泛舟，到湖对岸舍舟趋径，最后回到东扉的全天游历。全诗可分为三部分。前四句写山水清晖与游子心境悠然相契，引发出了妙赏情趣。次八句写在时空变化中对景物的具体观照，尤其是七、八句和九、十句，集体描写了巫湖黄昏景致：日暮时分光线暗淡，山色和云气逐渐融为一体，山林溪谷变得朦胧模糊，难以分别。而湖面上，由于水光反射，景色倒还清晰明媚，但也难以持久。菱角与荷叶倒映水中，层层叠叠，很是繁茂；葛蒲与稗草杂生一处，高高低低，互相牵扶。这是一幅暗示无差别本质境界的图景，山色与云气，山林与溪谷，菱角与荷叶，葛蒲与稗草，种种的差别，正在混同，在“贞观”中，诗人的自我意识也逐渐消失。最后四句写返观自我，他的情感经过了理智的过滤，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快乐，流露出了一种参透佛理而不受拘系的愉悦情绪。全诗写了诗人与山水的相遇、妙赏、超悦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心路历程，这形成了诗歌的深层结构，外现出来，就是叙事、写景、说理三部分的表层叠加。

三、始宁山居：佛教与名教的冲突

我们阅读谢灵运的山水诗，还常常可以感受到写景、说理以外的东西，这就是诗歌中常见的“情”、“志”二字，以及由它们所引发的冲突性力量。关于“情”字，饶宗颐曾说：

谢既湛玄言，又耽内典，情之与理，每交战于胸，虽借山水慰情，以理自适，若云“理来情无存”，似能以理制情者；然其含禀至情，实出天性。今观其语：“爱深忧在情”，“含情易为盈，遇物难可歇”，庐陵王墓下之作，直云“理感深情恻，定非识所将。”则情深之顷，难以理克，通人之蔽，固所不免也。阮嗣宗每屈情于理，故能口不臧否人物，以全其生；谢客则有所不能，屡申情于理之外，无以自抑，终以丧元。斯两贤之异轨，有足令人低徊深味。^{[1] 8(P53)}

人类的心理结构主要有志、情、理三个要素。人们处理感情的办法大致有两个，一个是去加强，在加强人生目标的意志中化解一时的情感问题，这就是以志统情。另一个是削弱，在削弱世俗价值的理解中去化解情感问题，这就是以理化情。在中国文化中，“志”为儒家所鼓吹强调，“理”为佛老所鼓吹强调，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尖锐的，谁占了上风，就引导情感的天平向谁发生倾斜。谢灵运遁迹山水，深契佛理，但仍有无法超越之强大者存在于其心间，这又是什么呢？儒家说：“诗言志”，不知人论

世,其可乎?我们有必要从其生平及时代中寻求其心其“志”,以进一步理解其人其诗。

谢灵运集中创作山水诗有四个阶段:赴永嘉太守任,约38-39岁;第一次隐居始宁,约39-41岁;第二次隐居始宁,约44-46岁;赴临川内史任,约47-49岁。总体看,两次始宁隐居是其重要的人生阶段。

陈郡谢氏自谢灵运曾祖谢安起,即以徘徊东山确立了“官一隐”两栖的出处方式。自谢灵运祖父谢玄起,又选取始宁山居以自处。谢灵运《山居赋》自注:“余祖车骑建大功淮、肥,江左得免横流之祸。后及太傅既薨,远图已缀,于是便求解驾东归,以避君侧之乱。废兴隐显,当是贤达之心,故选神丽之所,以申高栖之意。经此一山川实基于此。”^{① 2(P232)}由“废兴隐显”一语观之,退隐山居实为谢氏家族政治生涯中全身避祸之计。但从玄学中自然与名教冲突的角度加以理解,则山居又显示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意,即此又见高栖之情。晋宋易代之后,刘宋皇权对门阀士族的屡屡打击,应该是谢灵运退隐始宁的主要原因。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载:“高祖受命,降公爵为侯……唯以文义处之,不以名实相许。自谓才能宜参权要,既不见知,常怀愤愤。”^{① 2(P415)}“少帝即位,权在大臣,……出为永嘉太守。郡有名山水,灵运素所爱好,出守既不得志,遂肆意游遨……所至辄为诗咏,以致其意焉。”^{① 2(P415)}于是,谢灵运产生了隐退思想,《宋书》本传载:“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。并有故宅及墅,遂移籍会稽,修营别业,傍山带江,尽幽居之美。与隐士王弘之、孔淳之等纵放为娱,有终焉之志。”再后来,“文帝唯以文义见接……灵运意不平,多称疾不朝。”^{① 2(P416)}

谢灵运始宁山居的最大特点,就是佛学与文学活动。

在谢灵运的时代,玄学已渐为佛学取代,名教与自然关系已演变为名教与佛教关系,所以,佛教活动成为谢灵运山居的重要内容。

谢灵运在始宁墅大建僧堂,《山居赋》云:“面南岭,建经台;倚北阜,筑讲堂;傍危峰,立禅室;临浚流,列僧房。”^{① 2(P257)}山居常有讲经活动,赋云:“安居二时,冬夏三月,远僧有来,近众无阙。法鼓朗响,颂偈清发。散华霏霏,流香飞越。析旷劫之微言,说像法之遗旨。乘此心之一豪,济彼生之万理。启善趣于南倡,归清畅于北机。”^{① 2(P273)}谢灵运钦慕慧远,向往庐山,其《庐山慧远法师诔》序云:“法师嗣沫流于江左……可谓五百之季,仰绍舍卫之风。庐山之隈,俯传灵鹫之旨,洋洋乎未曾闻也。予志学之年,希门人之末。惜哉诚愿弗遂,永违此世。”^{① 2(P351)}

他亦欲把始宁山居缔造为传法圣地,赋云:“敬承圣诰,恭窥前径。山野昭旷,聚落膺膺。故大慈之弘誓,拯群物之沦倾。岂寓地而空言,必有贷以善成。钦鹿野之华苑,羨灵鹫之名山。”^{① 2(P255)}

另一方面,文学创作也是始宁山居时谢灵运的重要活动。自从陈郡谢琰死去以后,东晋高门士族中将才竭绝。贵族在军事、政治方面的失势已经成为事实,于是,出于维持谢氏门第文化地位之必需,使得文学的意义格外突出。

始宁山居的佛教活动对谢灵运的当时及后来文学创作大有影响。山居期间创作山水诗有《石壁立招提精舍》、《石壁精舍还湖中作》、《田南树园激流植援》、《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》、《从斤竹涧越岭溪行》、《石门新营所住》、《登石门最高顶》、《发归濑瀑布望两溪》、《石门岩山宿》等。这些作品,具有“山水不足以娱其情,名理不足以解其忧”的情理纠结。山居期间所作的《山居赋》对他的始宁生活作了详尽描述,赋有序,有正文、有自注。陈寅恪谓:“……可知本子即母子。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,其大字正文,母也。其夹注小字,子也。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,列入小注中,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。即所谓‘以子从母’,‘事类相对’者也。六朝诂经之著作,有‘子注’之名,当与此有关。”^{① 9(P183)}《山居赋》的赋、注形式,实受佛经本子注的影响。又,“灵鹫山”、“祇洹轨”、“长王宫”、“坚固林”、“庵罗园”、“鹿苑”、“净土”、“三界苦”、“四等观”、“四十八舍”等佛经用语散见山居前后灵运诗文,《和范光禄祇洹像赞》三首、《维摩经十譬赞》更是直接的赞佛诗。

谢灵运在始宁山居期间,以佛学和文学为核心,构筑了自己的士族文化,坚守着自己的士族旧梦。始宁山居的贵族世界,它的佛学及文学品格,对刘宋新朝造成一种文化压力或为其提供一种文化导向。《高僧传》卷七《慧严传》载宋文帝曰:“朕少来读经不多,比日弥复无暇。三世因果未辩厝怀,而复不敢立异者,正以卿辈时秀,率所敬信故也。范泰、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,本在济俗为治,必求录性真奥,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?”《宋书》本传载:“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,并有故宅及墅,遂移籍会稽,……每有一诗至都邑,贵贱莫不竞写,宿昔之间,士庶皆遍,远近钦慕,名动京师。”但另一方面,从刘宋皇权政治复兴与东晋门阀政治旧局之冲突的角度看,谢灵运的始宁山居又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。田余庆说:“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,谢氏这样的家族,对于皇权来说,既最有利用价值,又最具生事的危险。”^{① 9(P233)}田氏称刘裕与孙恩为东晋门阀政

治的“掘墓人”。孙恩起义,谢氏人物惨遭屠杀者,比其他士族门户都多。著名的如谢安之子谢琰,琰子谢肇、谢峻,谢铁之子谢邈、谢冲,谢冲之子谢明慧,谢奕之女谢道韞等。“自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当权以后,以迄刘宋之间,谢氏家族人物被刘宋杀戮者,比其他高门都要多,计有谢混、谢晦、谢灵运、谢综、谢约等,其中谢混是谢琰之子,谢灵运是谢玄之孙”。^{[10] (P233,231)}

《山居赋》说:“非田无以立。”谢灵运山居期间,好几次要占山护泽,加强其独立王国的经济基础。《宋书》本传载有两事值得注意,一是:“灵运因父祖之资,生业甚厚,奴婢既众,义故门生数百,凿山浚湖,功役无已。寻山陟岭,必造幽峻。……常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,直到临海,从者数百人。临海太守王诱惊骇,谓为山贼,得知是灵运,乃安。……在会稽郡亦多徒众,惊动县邑。”^{[1] 2 (P417)}二是:“会稽东郭有回踵湖,灵运求决以为田,太祖令州郡履行。此湖去郭近,水物所出,百姓惜之,顗坚执不与。灵运既不得回踵,又求始宁嵒湖为田,顗又固执。与顗遂构仇隙。”^{[1] 2 (P417)}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是大田庄。大田庄产业,一般都是山川与耕地相联的多种经营。田余庆说:“东晋朝廷主要靠稀少的自耕农赋役维持其存在,门阀士族主要靠占山护泽以图发展,而占山护泽自然又要分割山泽之内的本属朝廷的自耕农户口。所以经济上的矛盾一定是存在的。朝廷为了图存,或召免田庄奴婢为兵,或限禁占山护泽。但这些只能偶一为之,难收实效。因此,反映在政治上,是皇权无法伸张,士族自行其是,门阀政治就在这种情况下延续下去。”^{[10] (P353)}但晋宋易代,今非昔比,灵运的自行其是,决不能见容于当权。他欲掘湖为田,太守孟顗不许。新仇加旧恨,两人关系恶化。孟顗上表称灵运有“异志”,第二年,朝廷决断,将灵运出为临川内史,又过了两年,以谋反罪于广州弃市。谢灵运在刑前作《临终》诗曰:“恨我君子志,不获岩下泯。”^{[1] 2 (P112)}关于“志”字,饶宗颐说:谢诗云:“恨我君子志。”又曰:“忠义感君子。”诗所以道志,夫其君子之志,岂易为人知也哉。虽自言“贵不屈所志”,然在当日,已有“吾志谁与亮”、“拥志谁与宣”之叹。况千载之下,难以情测;然察其句,如云:“寸心若不亮,微命察如丝。”又曰:“守道自不携。”曰:“天鉴倘不孤,来验兹微诚。”忠义

之悃,早置身度外,逍遥山水,非同高蹈;张天如谓其隐遁非陶潜是也。子房、鲁连、龚胜、李业,皆当易代之际,有其自处之道;谢客于此辈,三致意焉,其志亦可窥矣。^{[8] (P53)}

谢灵运的山水诗毕竟不同于东晋诗僧的山水诗,谢诗中深含着情志与名理的严重冲突。始宁山居,并没有化解掉他的政治失意,也没能彻底消除他的政治欲望。从人格构成看,一方面,谢灵运本质上是名教中人,另一方面,他至多只是一个佛学家,并不是一个佛教徒。佛教徒在精神上隶属于僧侣,而作为佛学家的谢灵运在精神上始终隶属于士族。宋代陈舜瑜《庐山记》卷三《十八贤传》云:“陈郡谢灵运负才傲物……求入净土,师以心杂止之。”这则材料虽然不甚可靠,但也不会是空穴来风。《高僧传·僧苞传》载,或问曰:“谢公何如?”苞曰:“灵运才有余而识不足,抑不免其身矣。”张溥《谢康乐集》题辞谓:“以衣冠世臣,公侯才子,欲倔强新朝,送齿丘壑,势诚难之。……彼出处语默,无一近人,予固知其不杀不止。”^{[1] 2 (P437)}谢灵运在山水诗中虽然努力强调佛理的一面,但这也毕竟从反面彰显了他情志的悲慨,人生的失意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李雁.谢灵运研究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
- [2] 李运富.谢灵运集[M].湖南:岳麓书社,1999.
- [3] 汤用彤.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.
- [4] 郑临川等.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5] 宗白华.美学散步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.
- [6] 许理和.佛教征服中国[M].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03.
- [7] 吕.中国佛学源流略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- [8] 饶宗颐.澄心论苑[M].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1996.
- [9] 陈寅恪.支愍度学说考[A].金明馆丛稿初编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1.
- [10] 田余庆.东晋门阀政治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9.